我国参与国际循环传统模式面临大考

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韧性和支撑技术和产业创新转化的能力是应变之道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升和经济总量的增大，我国传统的曾经十分有效且作出巨大贡献的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将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越来越大的压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日前在国家发展论坛第五届年会上提出警示。他说，发展阶段变化也使我国形成了巨大而独特的内部发展优势和潜力，为应对挑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需要我国加大力度充分发挥潜力。

张军扩表示，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逐步形成了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基本模式。此模式有两个基本特点，从供给侧来讲，是不断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提升自身技术水平，并基于国外技术、设备和产品的可获得性建立我国的产业体系。从需求侧来看，我国企业凭借优越的要素组合优势和独特的制度环境优势，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也不断降低成本，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持续提高，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也日益扩大。

“上述参与国际大循环的模式，适应了当时国内国际的发展条件和环境，对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发展阶段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张军扩表示，一方面，传统的技术进步和对外合作方式面临调整的压力。过去，我国技术水平与先进技术的差距比较大，对国外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不会与发达国家的产品形成竞争关系，而是形成上下游的利益共同体关系。但是，当我国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显著提升，尤其是有些方面处在比较领先位置时，不少产品开始形成与发达国家产品竞争关系，矛盾和摩擦便随之而来。另一方面，我国出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出口份额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国际竞争格局的调整和变化，国家间一些产业和企业竞争力此消彼涨，甚至一些产业和企业会在竞争中萎缩，或者被市场淘汰。这种情况在我国发展的早期阶段影响不明显，但当我国达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量，并仍然以相对比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时，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矛盾和冲突也就会越来越多。

但我国发展水平提升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也形成了新的发展优势和潜力，从而为克服挑战、保持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张军扩表示，我国具有诸多独特的要素供给和组合优势。比如，从劳动力要素供给来讲，我国的劳动力资源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类型多元，既有海量的普通劳动者，也有数量庞大的高素质劳动者，并且性价比较高，有利于形成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并且在不同产业层次上形成竞争优势。

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今年1—9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其中三季度增长5.8%，呈逐季回升态势。

“我国门类齐全的制造业体系和生产能力使得我国具有独特的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韧性和支撑技术和产业创新转化的能力。”张军扩提及一家企业在疫情初期转产生产口罩的例子。十天造出口罩机，并迅速量产，39天实现96台设备投入生产，到4月初就达到日产1500万件的生产能力，现在基本稳定日产3500万件。在他看来，上述企业能够如此快速的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既是基于其内部所积累的能力和优势，也与我国整体的产业配套能力密切相关。

“从长期发展看，我国必须加大在关键核心技术方面自主创新和核心攻关的问题，着力解决核心技术、核心设备、关键零部件受制于人的情况。”张军扩表示，但也必须明确自主创新和集中攻关不等于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以我国为主的充分吸收和利用国际资源的开放创新，是在充分发挥我国基础和优势的前提之下，在若干重要的关键核心技术方面取得优势。

疫情考验下 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

■ 孙昌岳

2020年，不易且不凡。尽管遭遇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但“一带一路”建设仍呈现十足韧劲，交出亮眼成绩单。

近日，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巴经济走廊最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巴基斯坦PKM高速公路项目（苏库尔—木尔坦段）正式移交通车。“中巴友谊之路”的再次升级，是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务实合作的缩影。

疫情发生之初，外界普遍担心“一带一路”合作会出现停滞。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建设项目始终稳步推进，“化危为机”。

一方面，原有项目按时推进。如中企承建的厄瓜多尔美纳斯水电站土建工程6月完成移交；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首个正式启动的大型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巴基斯坦拉合尔轨道交通橙线项目10月正式开通运营。

另一方面，一批批新项目上马。6月，塞尔维亚伊维拉克—拉伊科瓦茨快速公路开工；7月，由中方融资并实施的乍得国家信息产业现代化项目开工；8月，“一带一路”建设标志性工程—加纳滨海大道项目升级改造工程开工仪式在加纳首都阿克拉市举行……

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重要项目、横跨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凭借独特优势和“硬核”实力，跑出了“加速度”。

截至11月5日，今年中欧班列开行达10180列，已超去年全年开行量。运送货物92.7万标箱，同比增长54%，往返综合重箱率达98.3%。运输网络持续拓展，已通达欧洲21个国家、92个城市。驰援全球抗击疫情，运送医疗物资近800万件，共计6万多吨。在疫情肆虐和经济逆风中，中欧班列挑起“大梁”，成为中欧之间抗击疫情互联互通的“生命通道”，为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贡献了“中国力量”。

突如其来的疫情没能阻挡“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产能合作持续向前推进。

《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降低约40%，达到近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到2022年才会复苏。然而，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合作始终保持稳定。今年前10个月，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7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83.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8%，占同期总额的16.3%，较上年同期提升3.6个百分点。对外承包工程方面，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838份，新签合同额6447.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5.5%。

进出口贸易方面，今年前三季度，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9634.2亿美元，虽然同比下降1%，但增速比全国整体水平高0.8个百分点；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130.2亿美元，同比增长29.7%，高出全国整体增速32.3个百分点。

“一带一路”正在向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目前，中国已与138个国家、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2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共同开展了2000多个项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将开辟更多发展新空间，为各国发展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蓝图更加清晰，路径更加明确，举措更加有力，将源源不断地为世界经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被新冠疫情席卷的2020年，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社会民生遭遇重创，各行各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全球抗疫防疫的过程中，新业态不断涌现，机遇与挑战并行。

疫情激发了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网上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非接触经济”全面提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俄罗斯拟上调大豆出口关税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计划对大豆等粮食上调出口关税。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呼吁平抑国内粮食价格。

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日前报道，俄罗斯关税机构下辖一委员会同意对大豆出口征收30%的关税。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新税率定于明年2月1日生效，持续至6月30日。这一委员会同样批准对废钢出口实施5%的关税。

除采取措施限制大豆和废钢出口，俄罗斯政府上周宣布，明年2月中旬至6月底，将对小麦征收每吨25欧元（约合200元人民币）的出口关税，同时抓紧落实此前宣布的谷物出口限额。路透社援引农业咨询机构SovEcon公司提供的数据报道，新税率将使俄罗斯2020年至2021年小麦出口量减少200万吨至300万吨，降至3780万吨至3880万吨。

在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期货价格21日上涨至6年来高位。玉米和小麦期货价格同样上涨。

除俄罗斯政策因素，路透社报道，南美洲近期天气不利于作物生长。

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一名匿名谷物交易员说：“供给版图发生变化。南美的问题令市场岌岌可危。”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谷物期货交易所上周说，干旱天气影响阿根廷大豆种植。另一方面，阿根廷油籽工人和粮谷检验员上周持续罢工，致使豆粕生产和农业出口停顿。尚无迹象表明，劳资双方会在短期内就薪资问题达成一致。　**（卜晓明）**

日本对华出口连续增加

根据日本财务省日前发表的贸易统计速报，11月份，日本出口额6.1136万亿日元，同比下降4.2%。对华出口持续增加，对美对欧出口双双下降。尽管11月份进出口盈余3668亿日元，但不及预期。数据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影响扩大，对外贸易出现停滞现象。

在出口方面，日本对澳大利亚轻质油、对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地区钢铁出口明显减少。同时，对美出口额为1.1813万亿日元，同比下降2.5%，主要体现为飞机零部件、医药品下降明显。

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3.8%，出口额达1.3595万亿日元。至此，日本对华出口已连续5个月增长。在进口方面，日本当月进口额为5.7469万亿日元，同比减少11.1%。具体来说，日本从中东进口原油、从澳大利亚进口液化天然气均明显减少；从美国进口额同比下降13.9%。从中国进口商品同比增加6.7%，5个月来首次实现正增长，主要原因为手机、电脑等进口增加。　**（苏海河）**

数智赋能升级品牌洞察力

本报讯（记者　**周东洋**）“敏锐捕捉时代消费者内心的美好需要才是真正的商业秘密。从创立波司登品牌的第一天起，我就坚定地认为链接消费者的能力就是品牌力，来自市场的第一手数据是前进的重要依据。”高德康日前在2020年亚布力青年论坛第六届创新年会上表示，不以数据为依据，品牌引领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

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2020年，急剧变化的内外部环境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影响着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重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品牌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与消费者的交互方式、连接方式、对消费者获取方式正在发生着巨大改变。消费者偏好什么？如何在变局中破局？

高德康认为，一定要从被动变革思维转化为主动创造思维，始终坚持以消费者为中心，在全局性、体系化、更深层次的业务逻辑上形成一个整体的数智化转型目标，以技术与业务的高度融合服务消费者，精准对接有效需求，重构品牌洞察力。

“我们将数智化转型作为企业新基建的核心发力点，着力推进全域数据中台建设。重点包括新零售能力建设，商品快反能力建设和数据中心建设。”高德康介绍说，通过这三个最核心的动作，整合企业内部及外部大数据，以大数据助力对商品洞察和研究，提升产品研发的有效性和生产供应链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同时以大数据助力公司对消费者精细化分群，以提升公司对消费者更加精准的互动和服务能力。实践证明新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可以驱动产业链要素活动全面迸发。

主动拥抱数智经济，用数字驱动生产、驱动管理、驱动市场，对接时代消费者需求，带来的不仅仅是回归商业本质、回归顾客价值，更是未来企业参与竞争的核心品牌资产。2020《中国消费品牌发展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的购物车里，平均每10件商品中就有8件是国货，国产替代渗透率进一步提升，国货品牌迎来了黄金时代。高德康分析说，产品创新、价值创新、对接消费需求的创新创造，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优质化的消费需求，让国人在消费领域的文化自信持续高涨。“未来，我们将持续洞察消费升级下的用户需求，以领先的设计理念、新兴科技和创新工艺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科技含量和时尚度，努力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做到全球领先。”

金融数据跨境监管应平衡自由流动与隐私保护

■ 本报记者 **陈璐**

近年来随着“棱镜门事件”“汇丰银行案”等网络与数据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各国不断加强立法保护数据出境安全管控。而金融数据与个人隐私及企业合法权益、公共权益乃至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其跨境流动也必然意味着风险的复杂化、扩大化及不可控倾向。

“数据跨境流动风险主要集中于传输、存储和应用三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管理不善，都有可能引起数据泄漏风险，从而导致企业及个人财产的损失。”日前，其礼律师事务所大中华区银行与金融团队负责人郭绯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举例，去年，亚洲某厂商被爆出利用境外销售的手机收集用户信息并传送到合作伙伴服务器上共享，如果该服务器遭到黑客入侵，泄露的敏感数据落入不法分子之手，将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精准投放’的信息来源。此外，某律师事务所受黑客攻击，全球多名政要及演艺圈名人的私人信息遭泄露。”

“由于移动设备功能的不断升级和多样化，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企业通过GPS等定位服务跟踪用户行踪，甚至通过蜂窝基站、Wi-Fi、热点、蓝牙、麦克风、摄像头等设备收集未经授权的离线数据。另外，网络和搜寻引擎经营者还可能利用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漏洞擅自收集用户数据。”郭绯指出，脸书、苹果和谷歌等公司都曾经因违规收集客户信息或发生违规收集用户个人信息、银行卡、信用卡、购物历史和网上访问记录等隐私发生泄漏而产生信用危机或被欧美监管机构罚款或质询。可见，在监管和保护跨境数据的传输、存储和应用上，各国所仍需要做很多工作。

据悉，《2020中国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报告》中提到，2015年至2020年，我国关于与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有关的文件数量是2000年至2015年所出台文件数量总和的两倍还多。

郭绯称，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针对个人隐私保护、信息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等价值取向等，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陆续制定了相关的监管体系。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和欧盟的监管体系：美国主张数据自由流动，欧盟基于个人权利保护推出了一套系统的隐私保护体系，而中国和其他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则推出数据本地化政策。

“中国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的立法起步较晚。虽然在过去十年中出台了数量繁多的法规政策，但形式散，且涵盖的内容单一，没有形成独立的全方位数据法监管和保护体系。”郭绯介绍，2017年6月，《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明确了数据本地化的规定，同时将原来国内就数据保护偏碎片化的要求进行制度化。当前，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数据跨境传输的监管框架主要建立在两个层面之上：一是以《网络安全法》为基础普遍适用于各行业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保护体系；二是金融行业监管部门针对客户资料保密和个人金融信息而作出的特别规定。

有学者认为，目前的金融数据出境监管规定和要求较为严格，但也有较多不明确之处，使得金融数据出境的实际操作面临很多问题，需要后续立法和监管规定作出更加合理的规定。

“虽然数据本地化可以更好地保护本国数据，也有助于司法取证，保障政府执法权，但从长远看，在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允许数据依法、合规、有序跨境流动应是数据监管、跨境安全评估和应用执法政策制定的中心和发展方向。”郭绯认为，在应对全球性危机和重大事件时，适时、及时的数据分享可以使各国及国际组织、机构更及时和有效地协同合作，研究及制定应对措施。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的防控及疫苗的研制、试验需要全球不同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配合和信息共享。

“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项下的金融服务附件首次引入新金融服务、自律组织、金融信息转移和处理等规则，就金融监管透明度作出了高水平承诺。”郭绯指出，该附件在给签约国预留监管空间维护金融体系稳定、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为各方金融服务提供者创造了更加公平、开放、稳定和透明的竞争环境。这些规则将助力中国金融企业更好地拓展海外市场，吸引更多境外金融机构来华经营，为国内金融市场注入活力。